

经济制裁的理论探析：从传统分析方法到冲突预期模型

万筱萱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省大连市，116024；

摘要：本文回顾了经济制裁的定义、目标及其有效性的研究，分析了两种传统的经济制裁研究理论，即国内政治分析法和信号分析法，并探讨了 21 世纪以来兴起的经济制裁研究模型——冲突预期模型。在回顾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冲突预期模型在经济制裁中的应用，梳理了其逻辑基础，并讨论了该模型如何为理解经济制裁的动因与效果提供新的视角。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本文旨在为未来经济制裁的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制裁；国内政治法；信号分析法；冲突预期模型

DOI: 10.69979/3029-2700.24.8.009

根据全球制裁数据库的分析，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冲突的复杂化，经济制裁已不再单纯作为惩罚方式，而是成为各国调整外交政策、达成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经济制裁的形式不断演变，如何评估其效果、理解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以及揭示制裁行为的内在机制，成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课题之一。传统上，经济制裁的分析多使用国内政治分析法和信号分析法探讨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的行为模式。近年来，冲突预期模型作为一种新兴的分析工具，提出了全新的框架来评估经济制裁的实施与结果，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视角。本文将回顾经济制裁的相关研究，系统分析传统理论的贡献与局限，重点讨论冲突预期模型在经济制裁研究中的应用与评价，为经济制裁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提供新的启示。

1 经济制裁的定义、目标和有效性

经济制裁作为国际政治中常见的非军事手段，其定义、目标和有效性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中一直存在广泛讨论。理解经济制裁的基本框架对于全面评估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至关重要。

1945 年，Albert Hirschman 首先指出，大国可以利用经济胁迫迫使弱国让步。此后，各国的权威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制裁的争论不断。在定义经济制裁的问题上，学者们最为讨论的议题之一是经济制裁的政治属性。Hufbauer 将经济制裁定义为“有意的、政府主导的、惯常贸易或金融关系的退出或退出威胁。”并认为经济制裁旨在明确或隐性地寻求被制裁国家在政治

行为上的改变。这一定义强调了经济制裁中的政治目的。国内学者刘威和柳剑平指出，经济制裁是一种受限的经济行为，由多种因素驱动，旨在实现政治目标。因此，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经济制裁的政治属性。

经济制裁的目标也一直是研究关注的重点。Barber 认为，经济制裁有三个目的，即改变被制裁国的政策行为、表达制裁发起国的立场，以及考虑国际因素。。基于 Barber 的观点，Lindsay 进一步补充了经济制裁还具有政权颠覆和威慑的目的。国内学者阮建平总结了五个目标，包括惩罚或报复特定行为、威慑被制裁国进一步行动、强制性变革（包括政权颠覆）、遏制经济和军事潜力，以及展示制裁发起方的决心。Hufbauer 对制裁目标的分类则更加细致，具体包括：以相对温和和有限的方式改变被制裁国的政策、改变被制裁国的政权、制止军事冒险行为、削弱被制裁国的军事潜力，以及以另一种重要方式改变被制裁国的政策。

此外，大多数研究集中探讨了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及其评判标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Bergeijk 指出，关于经济制裁成败的多数文献呈现出一种周期性模式，通常是乐观观点之后紧随悲观观点，特别是有关抵制、禁运以及金融制裁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方面。Peter Feaver 认为，由于经济和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使用经济制裁实现特定战略目标的难度增加。克服这种不确定性需要谨慎地选择经济制裁作为主要工具，并在实施之前仔细研究这些复杂制裁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复杂的背景下，目前学界公认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衡量标准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

者在《经济制裁再思考》一书中总结的。Hufbauer 等学者收集了 1914 年至 2006 年间的 204 个经济制裁案例，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分类和深入研究，认为经济制裁在外交政策层面的成功取决于制裁发起国追求的目标实现了多少，以及经济制裁在实现外交目标方面贡献了多少。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在制裁有效性研究方面不如国外学者深入，但阮建平全面总结了影响经济制裁有效性的因素，如经济制裁的目标及其强度、经济制裁的手段、相对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国际社会对制裁的态度。

总体而言，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属于一种政治决策，其往往包含惩罚、报复、威慑、变革、遏制等多重目的，并且其有效性的衡量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制裁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经济制裁所占的贡献。虽然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不断，但经济制裁的定义、目标与其有效性不仅是国际关系领域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球政策制定的关键因素。

2 经济制裁的传统分析方法

从对经济制裁基本框架的研究梳理来看，学者们在定义经济制裁的属性、目标和有效性上不乏激烈争论，所持观点差别较大。这主要源于不同学者对经济制裁的性质、动机、功能以及影响因素的不同理解。目前，国内外普遍认可的对于经济制裁的分析方法有两种，即国内政治分析和信号分析法，笔者将其归纳为传统分析方法。通过这两种理论视角，学者们深入分析了经济制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国内政治分析法侧重于将制裁发起国与被制裁国国内的政治因素纳入到经济制裁发起的考虑。该分析法包含诸多分支，其中的一个分支着重考虑制裁发起国国内的政治，认为制裁发起国选择实施经济制裁的主要考虑因素是源于国内的公众压力。如果被制裁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规范，制裁发起国的公民就会有意愿希望国家做出相应的行动。即使制裁发起国的外交领导人同意公众的意见，但是其选择是有限的。一方面，有效军事干预的成本可能太高。另一方面，保持无所作为的国内政治成本是巨大的，因为这会给公众留下领导人软弱的印象。因此，制裁发起国的领导人将更加倾向转向经济策略，将经济制裁作为强力行动的不完美替代品。经济制裁可以转移国内压力，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表明制裁发起国政权对被制裁国行为的不满。经济制裁本身可能是无效的，但经济制裁的实施可以让这位外交政策领导

人避免被指责为“无所作为的领导”。许多学者表示了对国内政治分析法的认同。Barber 指出：“制裁的目的是展示其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消极地说，其目的可能只是为了转移批评。Daoudi 和 Dajani 也认同该方法，认为实施经济制裁的原因包括了应对公众的反应。另一个较为主流的分支则同时考虑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该分支的研究重点同时侧重于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国内的个人和利益集团。政策被视为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官僚机构共同选择的结果，因此，在该类分析中，经济制裁的走向在本质上受制于这些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通过分析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的政治结构、政府行为、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等因素，国内政治分析法能够揭示制裁的动机、实施过程以及其效果。Kaempter 和 Wenberg 在分析制裁发起国国内政治斗争与经济制裁之间关系时指出，制裁发起国的利益集团不仅影响是否需要实施经济制裁，还会影响制裁的类型和方式。由于制裁发起国在选择经济制裁时必须考虑各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和压力，因此制裁的设计未必总是按照最大化对被制裁国造成损失的原则进行。而考虑被制裁国国内政治时，该分支认为只有对被制裁国国内的权势集团造成重大的打击时，经济制裁才有可能实现其政治目标。虽然这两种分支均考虑了国内政治因素，并反对将国家视为自我效用最大化的单一理性行为者，但前者的象征性和不稳定性更为明显。

另一种传统分析方法是信号分析方法。相比于国内政治分析法注重分析制裁的发起过程，信号分析法更侧重于制裁的结果和影响。该方法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往往传递着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关于其政策、决心、期望、能力或底线的。而经济制裁的发出和实施也是其中的一类信息。通过经济制裁，制裁发起国传达的不仅是对被制裁国行为的回应，还有一些潜在的信号。正如 Biersteker 认为，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信号，这些信号不仅具有沟通功能，还在社会规范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广泛意义上，作为一种信号类型，经济制裁通常具有三种作用，分别是表明决心，即发出威胁性承诺并诉诸行动；作为象征性信号，避免对被制裁国敏感区域实施实质性经济制裁或避免采取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进行讨价还价，将经济制裁的撤销与其他诉求相联系。其中，第一种决心型信号是经济制裁研究的关注焦点。本质上，各国在一个信息不完全对等的世界中决定外交政策。如果

各国对其他国家的偏好缺乏了解，那么在国际危机中各方均存在通过发出“虚张声势”的信号来达成目标的机会。但是经济制裁的决心型信号功能的发挥通常受到制裁发起国政策清晰度和可信度的影响。Baldwin 指出：

“选择一种高成本的信号传递方式可能会增强信号的可信度”。Lisa Martin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观察到“高成本的制裁信号不仅有助于向被制裁国传递可信的信息，还能向其他可能的制裁发起国传递可信的信号”。如果制裁信号的代价较高，只想虚张声势的制裁发起国就不太可能使用它，因为真正进行实施的成本较高。因此，对于用以表明决心的信号而言，向被制裁国施加高成本的经济制裁可以成为其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然而，正因如此，部分学者也对经济制裁作为信号所发挥的真正效用持有怀疑，即，看似成功的制裁实际上是否只是一种隐性军事威胁的产物，而并非经济制裁政策本身带来的效用。

国内政治研究法与信号分析法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每种方法都从不同角度解释和理解经济制裁的效果、动机和目标。国内政治分析法有助于揭示内部决策动因，有助于预测制裁政策的变化，并且对于非理性决策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国内政治分析法往往忽视国际环境，并且难以量化各个因素。而信号分析法虽然有助于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理解经济制裁，并且强调制裁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但是对信号的解读仍然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难以量化信号的效果。总而言之，尽管国内政治分析法和信号分析法为理解经济制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它们在解释制裁效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新的理论视角亟待被提出，以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并为经济制裁的评估与优化提供新的思路。

3 冲突预期模型的逻辑与评价

21 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家 Daniel W. Drezner 的冲突预期模型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制裁理论，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该理论的基本前提完全对立于国内政治分析法。以博弈论为核心的冲突预期模型将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看做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并且相比于关注经济制裁的单向信号传递作用，冲突预期模型更加注重经济制裁作为国家间博弈工具的双向互动，从而分析经济制裁在国际冲突中的角色。冲突预期模型认为制裁的有效性不仅与制裁措施严厉与否有

关，还与制裁发起国与被制裁国之间预期冲突的高低密切相关。尤其在多变的国际局势下，Drezner 的理论强调了预测和评估制裁效果的复杂性。

冲突预期模型最初是由 Drezner 于 1999 年在《制裁悖论》一书中提出。他的目的是理解为什么国家会发起经济制裁，以及决定制裁成功与否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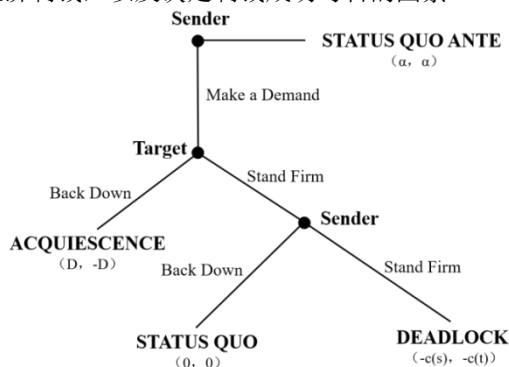


图 1 冲突预期模型

冲突预期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博弈论模型，其构建基于两个关键假设。首先，政府是理性且单一的行为体。其次，预期未来将发生频繁冲突的国家会更关注当前制裁所带来的相对成本分配。该博弈的结构如图 1 所示。博弈包含两个参与者：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制裁发起国首先做出行动，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提出要求并附带经济制裁威胁。这个要求对被制裁国政权有害，对制裁发起国有利。接下来，被制裁国必须在让步或反抗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被制裁国让步，结果就是“默许”，同意发起国的要求。如果被制裁国反抗，则由发起国做出最终决定：它可以选择撤回并接受“现状”，也可以执行经济制裁，导致“僵局”。“僵局”意味着双边经济关系的中断，可能涉及暂停援助、实施贸易壁垒、冻结金融资产或减少投资流动，这将对双方都造成损害。

该博弈模型中各个节点的成本是分析决策的基础。在冲突预期模型中，所有成本相对于“现状”进行衡量。“现状”下，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的成本被归一化为零。“现状（前）”产生基本相同的结果，但对双方都有一个小的增益（ α ）。“现状”与“前现状”的区别在于，发起国的威胁会暂时冻结双边关系，防止贸易或投资的进一步增长。即使威胁没有付诸实施，危机本身足以使经济关系蒙上阴影。在“默许”状态下，会产生直接的利益转移：制裁发起国获得利益，被制裁国损失要求 D。最终，“僵局”结果会破坏双边关系，双方因失去经济合作而产生成本，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分别遭受 $-c_s$ 和 $-c_t$ 的惩罚。

在博弈模型中，决策者的偏好非常重要，构成决策的基础。Drezner 认为，在经济制裁中，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不仅考虑制裁的短期机会成本，还关注它们对彼此之间未来冲突的预期。由于制裁通过对双方施加成本来改变利益分配，因此，在面对经济制裁时，做出让步意味着在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之间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资产。如果国家认为这种重新分配会损害其谈判地位，或削弱其在未来冲突中的经济甚至军事力量，它们就会关注这种重新分配。因此，未来冲突的预期会转化为对相对利益的短期关切。因此，随着冲突预期的介入，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会同时关注短期的绝对机会成本和相对利益。冲突预期越强，它们就越优先考虑相对利益，而对短期机会成本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反之亦然。

因此，在计算效用函数时，Drezner 引入了变量 β ，表示双方对和谐关系的相互预期，PS 和 PT 分别表示制裁发起国和被制裁国的承受成本。如前所述，如果双方预期未来的冲突较少，它们会更注重绝对收益。相反，如果双方预期未来冲突较多，它们会更多地关注相对收益。这一考虑可以通过以下效用函数来体现：

$$US = \beta \times PS + (1 - \beta) \times (PS - PT)$$

$$UT = \beta \times PT + (1 - \beta) \times (PT - PS)$$

作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国家在进行决策时会将不同节点下的效用函数比较，从而选择能为己方带来最大效益的决策分支。由此，Drezner 提出了“胁迫条件”和“让步函数”，用于评估制裁发起国可能施加制裁和被制裁国可能作出让步的条件。

为了确定发起国选择启动制裁的条件，必须比较在“僵局”状态下获得的效用是否超过“现状”下的效用。换句话说，如果 $US(DL) > US(SQ)$ ，则发起国愿意

坚持立场，即 $\beta^* < 1 - \frac{c_s}{c_t}$ 。该方程式称为“胁迫条件”。如果 $\beta < \beta^*$ ，则 $US(DL) > US(SQ)$ ；发起国更倾向于坚持立场而非退让，此时“胁迫条件”成立。根据“胁迫条件”，当双方预见到未来会有显著的冲突时，满足“胁迫条件”相对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发起国避免施加胁迫，机会成本必须几乎相等（即 c_s 接近 c_t ）。相反，如果两个国家预期的冲突较少，那么机会成本的差距需要相当大（即 c_t 较高， c_s 较低），此时发起国更倾向于选择僵局而非维持现状。因此，冲突预期模型的第一条主要结论为：冲突预期越高，或者双方之间的成本差距越大，发起国发起制裁的可能性就越大。

相应地，为了确定被制裁国何时可能选择让步，需要比较“默许”的效用与“僵局”的效用，最终得出，

在满足 $D^* < \frac{c_t - (1 - \beta) c_s}{2 - \beta}$ 的条件下，被制裁国更倾向于让步。该方程式称为“让步函数”。 D^* 表示最优可能的让步。随着机会成本差距的增大，最优可能让步的值也会上升。较大的差距使得“僵局”对被制裁国的吸引力降低，促使其接受更大的让步。此外，冲突预期对 D 的影响尤为显著。随着变量 β 的增加， D 方程的分子明显增加，而分母则减少，这表明冲突预期的减少会导致最优可能让步 D 的增加。因此，冲突预期模型的第二条主要结论为：冲突预期越低，或者双方之间的成本差距越大，被制裁国的让步程度越大。

自其发表以来，Drezner 的冲突预期模型一直得到不断的检验和验证，展现了其强大的解释力。该模型首次由 Drezner 本人在其著作《制裁悖论》中进行了测试。Drezner 考察了俄罗斯在 1990 年代利用经济制裁迫使 39 个新独立国家做出让步并影响其重要决策的案例。分析表明，冲突预期模型在预测方面表现出色。此外，Heather Meade 通过考察美国 2000 年对古巴等国的制裁，对冲突预期模型进行了评估，发现冲突预期与机会成本因素的结合能够证明其逻辑性和实用性。Hillebrand 和 Bervoets 利用 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新数据库重新审视了冲突预期模型的表现，发现该模型仍然表现良好，且在制裁分析中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此外，Drezner 的冲突预期模型在国内外学者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美国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Drezner 的《制裁悖论》一书介绍的冲突预期模型是 199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最佳著作之一。他指出，随着制裁可能继续成为 21 世纪国家行为的首选工具，该书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受到严肃关注。武汉大学的阮建平教授认为，冲突预期模型是解释经济制裁的三大主要理论之一。总而言之，Drezner 方法的清晰逻辑、对多种政策情境的适用性以及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验证，使其成为分析经济制裁中的一种较为可靠的理论方法。

冲突预期模型作为一种新兴的分析工具，凭借其将冲突预期这一因素纳入综合考量，展现了博弈论的简洁清晰，弥补了传统理论的不足，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为精准的分析框架。尽管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已取得一定影响，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博弈论的前提假设过于简化等，并且其具体应用仍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深化冲突预期模型的理论完善，并结合更多的实证数据，为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提供更为全面的评估。

综上所述,经济制裁作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工具,其理论基础经历了从传统分析方法到新兴冲突预期理论不断发展。尽管现有理论已为制裁的实施和评估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但随着国际关系和冲突环境的不断变化,现有理论仍面临挑战。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如何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准确预测和评估经济制裁的效果,并探索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通过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制裁理论的理解,不仅能为国际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也能为跨国冲突中的外交实践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参考文献

- [1] Hirschman A O.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 [2] Hufbauer G C, Schott J J, Elliott K A.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M]. Peterson Institute, 1990.
- [3] 刘威,柳剑平.从限制性的视角论经济制裁[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2(02):267-271.
- [4] Barber J. Economic sanctions as a policy instrument[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9, 55(3): 367-384.
- [5] Lindsay J M. Trade sanctions as policy instruments: A re-examination[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6, 30(2): 153-173.
- [6] 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7] van Bergeijk P. Can the sanction debate be resolved?[C]. CESifo Forum. 2019, 20(4): 3-8.
- [8] Feaver P D, Lorber E B. The Sanctions Myth[J].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15 (138): 22-27.
- [9] Barber, James.. Economic sanctions as a policy instrument[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9 (55): 367±84.
- [10] Daoudi, M. S., and M. S. Dajani.. Economic Sanctions: Ideals and Experience[M].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 [11] A. D. Lowenberg and W. H. Kaempfer. The Origins and Demise of South African Apartheid: A Public Choice Analysis[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118.
- [12] Thomas Biersteker, “UN Sanctions as Normative Signals: A Research Note”, Meet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tlanta, March 16th—19th, 2016.
- [13] Baldwin D A. Economic statecraft: New editi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4] Martin, Lisa L. Coercive Cooperation: Explain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5] Daniel W. Drezner.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6] Meade, Heather, “Statecraft through Economic Coercion: Applying the Conflict Expectations Model to China and Cuba” (2000). WWU Honors Program Senior Projects. 233.
- [17] Hillebrand E, Bervoets J.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Sanctions Paradox: A Post-Sample Validation of Daniel Drezner’s Conflict Expectations Model[J].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2013.
- [18] 阮建平. “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理论述评.” 世界经济与政治 9 (2004): 32-37.

作者简介:万筱萱(2000年7月—),女,汉族,湖北省麻城市,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化与外交